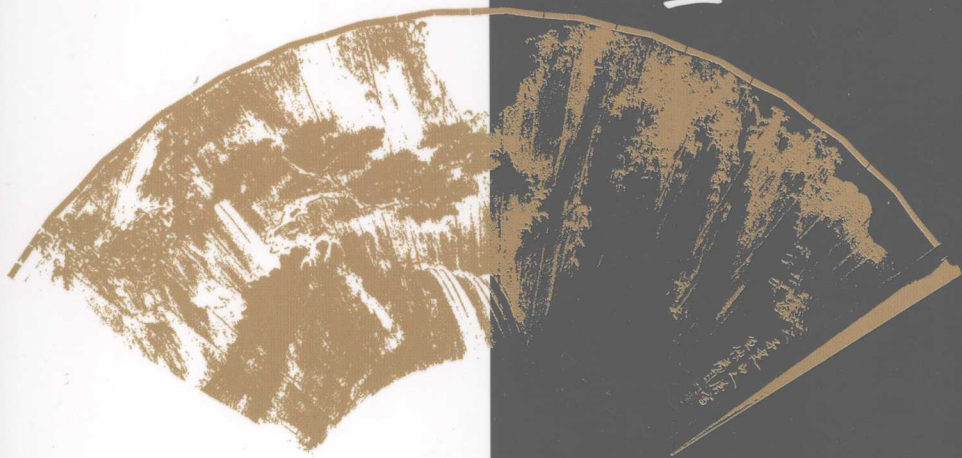


唐宋变革
与宋代
审美文化转型

刘方◎著



学林出版社

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培养基金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规划课题

浙江省教育厅重大课题

结题成果

资助出版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刘方◎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 刘方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0730 - 784 - 6

I. 唐… II. 刘… III. 审美分析—文化—研究—中国—宋代 IV. 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826 号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著 者——刘 方

责任编辑——曹坚平

特约编辑——刘 浏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7 万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784 - 6/I · 136

定 价——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导论：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问题思考与 研究方法	001
---------------------------------------	-----

唐宋变革、宋型文化转型的宏观视角——探索和剖析何以
形成宋代审美文化的原由——回到思想产生的原初的文化语
境与历史脉络之中——格尔兹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借鉴意
义——范仲淹形象的建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典范
的影响与启迪——充满了争论、歧义和竞争性观点的学说领
域——宋代审美新变的历史生成语境与内在理路

第一章 唐宋变革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	023
----------------------------	-----

第一节 内藤命题的学术史意义、价值与范式的局限	024
-------------------------------	-----

内藤命题及其在日本的发展、丰富与争论——京都学派与
东京学派——官崎的思想基于内藤学说也突破了内藤学
说——东洋的近世特征

第二节 欧美学者的当代发展与新的研究模式及其问题	033
--------------------------------	-----

士人在唐宋时代的变化——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社会流动性——精英的地方化——人口、地域、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

第三节 唐宋变革理论的重审与本课题研究的思考 041

日本和欧美学者较少甚至未曾进行思考的视角——本书主要着力研究的方面——唐宋变革发生在何时期——判断文化转型的指标——为什么南宋以后精英们更加关心地方——南宋社会、政治、文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任何历史的书写都是一种后设的理论假说——历史时期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复杂的关系——唐宋变革的历史所具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没有引起关注的构成中国宋代近世社会的几个方面——宗教的世俗化——城市化——媒介革命——隐逸文化

第二章 隐士范型的重构与宋代士大夫新的审美精神

追求——以严光为核心的考察 059

第一节 隐逸文化在宋代的转型 059

宋代隐逸文化的转型——精神信仰重建——人格的独立与自由——重建士风——个体的人格修养和道德风范成为群体意识

第二节 隐士谱系的重新建构——严光的再发现与

再塑造 064

重新发现和再塑造严光形象——新的隐逸文化观的建构与传播——普遍的对于自由之精神的追求与肯定——以道抗势的高洁人格——士大夫群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焦点

第三节 新隐逸典范合法性的获得和士大夫的普遍认同

..... 082

新隐逸典范合法性的制度化过程——不断重建严光祠堂
也不断重新确认隐逸典范——逐渐影响到社会风尚与文化心理
——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地方性崇拜

第四节 文学想象：严光典范的不断重塑与强化····· 098

想象、记忆的再生产与再创造——不断阐释和拓展了典范意义与内涵——积极参与严光典范的建构——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再生产新的价值观念——高尚隐逸、声名不朽——建构典范对于更大思想史叙事的意义——个体价值成为一种理想、永恒的价值标准——思想上的突破

第五节 实际影响与文化意义····· 125

强化社会普遍主流意识形态——分享主流话语——参与建构一个想象共同体——独立人格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支持个体从事崇高伟业的精神动力与理想——宋代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典范重塑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双向建构

第三章 唐宋城市革命、市民审美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139

第一节 宋代城市物质空间的转型：新的城市阶层与 审美文化生产的舞台····· 142

宋代发生的城市革命——坊市制度的破坏——城市功能的商业、经济的转型——市民文化的崛起——市民审美文化的繁荣——城市书写的文学叙事——繁华都市

第二节 市民审美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繁荣····· 158

市民文化繁荣——审美文化生产与消费——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市民的意志与审美趣味——市民意识的产生——市民阶层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汴京都市意象····· 170

多重的都市意象——城市景观——帝京标志——“河市乐”——市民艺术的繁荣

第四节 市民文学视野中的北宋东京大众审美文化与市民娱乐空间 180

集中体现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味——市民对于繁华都市的关注焦点和欲望对象——以往的文化和文学传播格局都打破了——城市成了小说创造曲折情节与动人故事的场所

第五节 繁华、娱乐与欲望：节庆与市民娱乐空间 190

新的文学叙事的主题——打破了日常的禁忌的元宵狂欢——市民大众欲望的投射和白日梦的制造

第六节 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与市民梦想的都市书写 200

充满财富欲望与享乐欲望的新兴阶层——宋代都市游乐文化之盛——游观金明池如此狂热——城市也为士子提供了政治机遇和命运的转机。

第七节 帝京文化的另外一种面相：对于主流帝京意象的解构与颠覆 218

森严的纲纪礼教在市民文艺的谐趣中轻松地化解了——都城之中的社会治安有着比较大的问题——对于现存秩序的挑战与反叛——打破了皇权所极力营造的太平盛世的假象——新的审美需求刺激新型的审美文化的发生

第四章 宋代媒介革命、新型的文学生产与审美文化的诞生与影响 222

第一节 媒介革命的文化史、社会史意义及其对于宋代文化研究的启示 225

文明史就是媒介演进史——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印刷术给文学生产带来了哪些深刻变化——如何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与阅读、影响的每一个环节与方式

第二节 宋代印刷媒介的发达与出版文化的繁荣 242

宋代空前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雕版编印书籍的活动——私人书坊纷纷设立、书坊刻书销售已成为书籍流通的重要途径——弘扬文化、传播学术——重视市场需求,印制大众读物——刊刻书籍的价格——版权保护——普及教育和增进文字阅读能力——以阅读为中心的阐释方式

第三节 印刷、出版繁荣对于宋代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等诸方面的影响 253

文学创作变化为文学生产——为满足消费群体而进行的文学生产活动——文学的传播克服了物质与技术上的困难——改变了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阅读书目——读书方法——文本形态的变化——藏书文化——文字狱——“乌台诗案”所体现的现代性——选本批评、评点

第四节 宋人文集的刊刻、出版与文学传播、接受方式的改变 267

加快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建立自己的文学声誉——诗作遍地、文人辈出的时代——宋代出版之盛——著名士大夫参与其中——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对文学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 坊刻出版如何影响宋代文学的风尚与发展走向 275

坊刻书籍在文化传播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坊刻的发展对近现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发展的贡献——出版唐人诗文集,

影响文学风尚和文学发展趋势——书坊刊刻书籍的普及与巨大影响力——影响和推动某些新型文学生产的萌芽和产生——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与传播——书坊群体的存在影响新的文学生产的转型

第六节 新型的文学生产的产生 289

近代意义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成为整个商业化活动的一个环节——文学生产的主体,媒介环节和消费群体、市场——依靠书坊刊刻诗集获取利润而生活——出版、流通、传播的市场——书坊依赖大众消费市场而生存——市民阶层文学消费的需求——为市民阶层这一新的阅读群体而写作——新型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化产品出现——正统士大夫群体对于新型文学生产的批判——新型大众审美文化——文化趣味的区隔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主要参考文献 309

导论：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问题思考与研究方法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宋代研究得到重视和发展，“宋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众多学者，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以及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等方面，对于宋代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来看，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对宋代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审美文化的新变和转型的研究，就是一个相对被冷落的领域，对于宋代审美文化的新发展，特别是宋代审美文化新特征的形成、发展等与所处转型中的宋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仍然是一项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课题就是要研究宋代这个历史时期在面临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情况下，出现的市民审美文化繁荣、审美文化媒介的转型和新隐逸文化典范的建构等一系列新的审美文化现象，探索这些文化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特别是要在广阔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发掘、阐发宋代审美文化中，长期被遮蔽、忽略的重要内涵，从唐宋变革、宋代文化转型这一宏观视角入手，探索和剖析形成宋代审美文化的原由。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努力结合、借鉴、吸收现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新成果，努力突破中国美学与文学思想研究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脱离

孕育理论思想的特定文化土壤的研究模式,以孤立的代表人物研究加以逻辑串联的历史研究方法,努力使课题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使研究得以深化与细致。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宋代文化进行的都是专门史的研究。专门史追溯的是某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在历史中的演化过程。美学史、文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经济史、哲学史等,全都是专门史。专门史的特征在于,它只处理一种主题,它并不依据社会时间(Social time)来理解它的对象。专门史处理的是一些并不遵循社会时间的人类活动,并且,它们并不连续地展现自身。有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时间流逝了一百年,人们找不到在这段时间内表现活跃的哲学家,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写作专门史,因为专门史可以径直跳过那些阶段,而将单一传统中所有从事美学(或文学、哲学、历史等)的人聚拢到一起。专门史依靠回溯性的视角,把所有参与这种人类活动的人们当成是单一整体的部分,从而创建了某种连续性。通过回溯手法以断言某种连续性,这种方法在过去也不罕见。它并非现代学术的专利。很好的例子之一是,道学家建立道统谱系的持续的努力,从韩愈《原道》、石介《尊韩》一直到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中,就可以发现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这种方法的典型做法是,挑选一系列前人,并排列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先驱,并将他们组成一种专门史。运用依靠回溯方法创建连续性的方法的,还可以见诸佛教、诗学、经学注释,甚至还可以见诸政治制度的领域,而这也恰恰是今天的专门史研究中最典型的安排历史线索的方法。专门史的研究,往往是以时间排序和以逻辑串联起来,这样的历史发展,往往与历史实际发生的场景相距甚远,与其说是历史的发展,不如说是研究者头脑中的理论构想。

美学的专门史研究路径,习惯于首先是将美学思想、内容从产生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理论性的美学思想表述,从丰富的美学材料中抽离出来,以至于美学家及其思想与他们的实际

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自始未曾进入美学史家的视野。而依据西方美学研究框架进行传统中国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大量和丰富的材料，往往因为没有像西方美学那样形成有形式特征的理论知识体系，从而也就消失于透过西方美学理论研究框架来看中国美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美学史家的视野。

本研究的思路与美学史的专门史研究路径的差异在于，本课题涉及的研究领域，是有关中国宋代文化中的审美方面，有关宋代文化的审美特质、审美走向、审美观念的变迁，新的审美意识、趣味等的诞生，及其产生它们的物质条件、文化语境等。本课题的研究，是希望将中国美学理论的研究，放置回到思想产生的原初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脉络之中，回到思想的原初场景，通过中国美学的内在理路，来重新思考中国美学中许多重要而被长期忽视和遮蔽了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内在理路这一概念的理解，一方面不同于余英时先生，他所谓的内在理路，更接近于观念史，如他的《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里主张的内在理路说，^①尽管余氏并不全盘否定外缘论，即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对学术思想造成影响的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观念论取向使得思想史很容易成了浅显的哲学史。另一方面，我对于内在理路的理解，虽然更接近于哈耶克的自发建构，^②但是其间也有所不同，哈耶克更多的是对于制度的理解，而我则主要是对于文化的自然发展的内在趋势的一种理解。当然，我所谓的中国美学，其研究范围、内容、模式和方法，与观念史方式的既有模式有明显区别。我的研究，是一种广阔文化视域下的综合多学科知识、成果基础之上，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和提出新的学术问题的跨学科的研究。我的这一研究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文化美学的研究。

① [美] 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英]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研究已经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抽离出产生他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且将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对象,抽象为符合西方理论研究标准的干巴巴的几个条目。在可以找到与西方理论体系相对应的地方,就直接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参照系。在不能直接找到对应的中国理论思想的研究中,通过一种类比关系的建构,来解决研究内容和对象,比照地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参照系。这样,不仅中国美学思想中与西方美学可以比照的内容,成为西方思想的脚注,就是中国思想中的独特内容,也只能作为一种比附性的内容,作为一种依附性存在而获得从属价值,并在这种比附关系中,获得中国美学的合法性。而不能组织进这种类比关系或者比附关系的中国美学传统的材料、内容、思想,就成为被忽略、舍弃和遮蔽之物。

在思想重建的现代学术背景下,中国美学在自己传统体系的分类中,找不到能直接对应的部分。但现代学术的本质,正像华勒斯坦所说的“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①在这种制度结构中,知识形态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清晰界定和尽量采取准科学的姿态,社会科学诸学科便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②“中国美学”在现代学术形态中所对应和临摹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西方美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成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这样的“中国美学”,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固有的,而是现代知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想象的推及,只能是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美学。

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

① 参[美]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② 参[美]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

方法和新的成果,开启那些被长期遮蔽了的中国审美文化独特内容的论域,以新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从文化视野、内在理路来思考。在历史的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和多重叙事线索中,研究宋代审美文化新变。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当代一些学科的新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资源,将使研究获得新的视野和新的启迪,从而建构新的更为有效的理论解释模式。

而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描”说理论,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

格尔兹认为,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中的,而文化正是这个意义网络,因此格尔兹认为对一个文化的分析了解是要去解读其隐藏的意义,而不是以科学实验的态度去找寻规律与通则。关于文化的定义,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文化是人类用来解释他们的经验,指导他们行动的意义结构;社会结构是行动所采用的形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①

格尔兹的文化概念是意义性的。他将文化视为一个有系统的意义网络,而文化的各个层面,例如宗教、艺术、常识、法律、意识形态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系统。格尔兹认为这种文化系统的意义是建立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的象征性行动。人的行为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象征性的动物,是使用象征性符号累积生存经验、代代相传、进行沟通的。人的行为负载着意义,好比人的行动会说话,而人所建构出来的意义是一种“社会性话语”(social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第167页。又[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第177页。

discourse)。每个行动都在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意义,行动与行动之间的联结、交换、互动形成一段段的对话,因此我们对某一行动或某一种文化现象的了解就必须将之放在原来的“脉络”(context)来解读,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意义的解读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格尔兹还认为意义的传递与交换是公开性的、社会性的,而不是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换句话说,意义是在同一脉络中的行动者所共同建构出来的、共同分享的。要之,格尔兹的文化概念是以行动者与其行动所负载的意义为核心,脉络、社会互动为解读这公开性意义之关键。

在“深描”一文中,格尔兹借用赖尔的“深描”一词指出,对文化的描述有两种,一种是“深描”,一种是“浅描”。他还用赖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描写:设想有三位正在眨眼睛的少年,其中一个是无意的眨眼,一个是使眼色的眨眼,一个是在恶作剧似的模仿眨眼。他们的眨眼动作是相同的,都是抽动眼皮。在浅描的民族志中,如照相机拍的照片一样,我们区别谁在无意识地眨眼,谁在使眼色地眨眼,谁在排练似的眨眼。而深描式的民族志则感知、阐释这几种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从而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深度的描写。

在格尔兹看来,深描关注的是如何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就是人类学了解的关键,即人类学的了解并不在于捕捉在研究地点发生的事实,而是如何去澄清在该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意义活动),以减少困惑。^①

从上述的论点看来,格尔兹是把民族志或田野工作视为一种话语,或者说,论述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慢慢接近、掌握我们所面对的文化脉络,并与我们的研究对象达成沟通、共享了解。因此,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可说是一种“文化阐释”——处理在一个表达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系统的意义如何在另一个意义系统表达。

在《地方性知识》一文，格尔兹指出法律与民族志一样都是属于“地方性”的工作，因为两者都是借“地方性知识”而有所作为，换言之，两者的知识与了解都有时空的意涵。格尔兹认为民族志的事实与法律的事实一样都是透过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文化设计好的象征性符号所呈现出来的事实，透过一组组的文化符码我们解读事实所隐含的意义。每一种“事实”可以在数种不同的伦理规范下解读，在数种事实的版本中的一个选择也会引发某种特殊的伦理规范，这些都与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格尔兹的文化思想中，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都应保留下来，并以“地方性知识”一词表征之。所谓的“地方性”不仅只是地点、时间、阶级、事件等，更是一种地方特色——一种事情发生经过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的想象能力相联系。

因此，文化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想象、一种阐释、一种建构、一种转译。因此，文化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更是一种“文化阐释”(cultural hermeneutics)。^①

格尔兹的“深描说”虽然是针对人类学的，但是，同样也在宋代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上，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目标，是一个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已经陌生和异己的文化现象，20世纪新文化运动所导致的现代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刻断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认识、思考和反省。^② 由于这个文化断裂，在从小就开始接受现代西方知识谱系和价值标准的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愈来愈远离甚至背离了自己的民族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本)，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美]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文化传统。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观念、审美趣味与文化语境等均与今天有极大差异,是一个我们愈来愈不能很好认识 and 理解的,愈来愈陌生的历史文化现象。以今度古,将导致极大的误解。而格尔兹的“深描说”,则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宋代审美文化。

格尔兹将一种让外人感到茫然的、毫无意义的、充其量只是巴厘人赌博好胜的游戏行为的斗鸡,与巴厘人普通生活、艺术表现、伦理道德以及信仰之中的禁忌、心理等联系了起来,揭示了一种社会性的仪式行为背后所具有的人类深层的文化心理。

格尔兹发现,在深层的斗鸡游戏中,金钱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或期望的效用尺度,不如说是一种被理解的或者被赋予的道德意义的象征。在深度游戏中,尽管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与地位有关的名望、荣誉、尊严和敬重,而所有这些又都仅仅只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实现。格尔兹寻找到了一种游戏的形式与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格尔兹论证了深层的斗鸡游戏是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过程。他从一个游戏的秩序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秩序。^①

格尔兹将文化模式的分析从一般说来类似于解剖生物体、诊断症状、译解符码或者排列系统转换——当代人类学中占优势地位的类比方法——转换成为一种一般来说类似于洞识于一个文学文本的方法。在这种分析方法中,作为文本的文化模式是由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人们在斗鸡游戏中表现出来的激动、绝望和欢欣,使社会得以建构,个体得以汇聚,也形成和发现了个人的气质以及社会的特征。而这也恰恰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视野。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阐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